

湯志祥 編著

廣州話
普通話
上海話

6000常用詞 對照手冊

粵

普
日

滬

咯Aㄞ底 • 咯肢窩 • Aㄞ咯肢

孤寒鐸 • 吝嗇鬼 • 小氣鬼

大隻佬 • 大個子 • 大塊頭

中華書局

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圈吸引愈來愈多的投資者。早在20世紀80年代，香港人已是進駐“珠三角”經濟圈的先行者，現在，我們的目標已指向“長三角”經濟圈。要到“長三角”發展，香港人必須掌握好語言，除了普通話，上海話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精通“粵”“普”“滬”三種語言，我們才可以在內地更好地發展事業或開拓更多商機。

本書正是因應這種大趨勢而編著的一部同時學習三種語言的工具書，其特色包括：

- 收詞超過6,000條，並分為26大類，涉及日常生活的每一範疇
- 廣州話、普通話、上海話並列，同時學習3種語言，互相對照
- 每個詞條分別加注廣州話、普通話及上海話的拼音，做到可認、可讀、可懂
- 編有以廣州話為座標的檢索系統，方便查閱
- 附有廣州話、普通話及上海話的拼音方案，有利學習

ISBN 962-8820-83-4



9 789628 820832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98元

湯志祥 編著

廣州話 普通話 上海話

6000常用詞
對照手冊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梁偉基
□ 裝幀設計：張錦良

廣州話・普通話・上海話 6000常用詞對照手冊

□

著者

湯志祥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6室

電話：25250102 傳真：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2100 傳真：24073062

電子郵件：info@suptlogistics.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

新藝工業大廈6樓G、H座

□

版次

2006年8月初版

© 200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ISBN-13：978-962-8820-83-2

ISBN-10：962-8820-83-4

編著者簡介

湯志祥，深圳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教授。畢業於上海教育學院，復旦大學文學碩士，香港理工大學哲學博士。師從著名語言學家胡裕樹、許寶華、湯珍珠。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語方言學、詞彙學、社會語言學和對外漢語教學。

曾先後受聘於香港城市大學進修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授有關語言學習課程。2002年起，擔任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學術顧問。2005年參與“國家語委”應用語言文字重點專案《全球華語詞典》，擔任港澳組主持人。

編寫出版有《普通話》（二）（三）；學術論著有《當代漢語詞語的共時現狀及其嬗變》，對外漢語教材《今日漢語》、《實用上海話》、《基礎上海話》等共6種28本；發表學術論文有〈論二十世紀末粵語對漢語和漢文化的影響〉等50多篇。

代序

語言研究為語言應用服務的一個範例

——讀《廣州話·普通話·上海話6000常用詞對照手冊》

詹伯慧

語言研究總是要為語言應用服務的，古往今來，莫不如是。中國古代的語文學——音韻學、文字學和訓詁學，哪一門不是面對語文應用的需要，為解決語文應用中某一方面的需要而產生？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科技發達，語言學科的研究，其內涵早就大大超越了我國傳統語文學的範圍了。當代語言科學實際上不能只被看作是屬於人文社會科學，它已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一門科學了。現在的語言研究不僅要為社會上千百萬人的語言學習和語言應用提供直接的服務，還得考慮如何為科技的進步和發展服務。語言研究和科技發展相配合，其結果必然是相互促進，推動語言研究結合語言應用的實際，更好地為語言應用服務。拿電腦的應用來說，倘若電腦中的語言符號系統使用起來不夠完善或不夠方便，這就有可能需要語言研究的成果來提供改進的辦法。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立的“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的成員中就有研究自然科學的，甚至其領導層有一位副會長就是電腦科學的專家。

當今的社會處處都顯示出語言和文化多元化的景象，它跟舉國上下人民意志的統一，跟全國人民齊心協力共建現代化祖國的偉大使命不會產生矛盾，更不會形成阻力。拿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來看，無可置疑的是：時下在社會語言應用和家庭語言應用這兩個不同的語言應用層面中，普遍存在着語言使用多元化的現象。一方面，全國上下都在推廣民族共同語——普通話，一個擁有十億以上

人口的民族沒有一個全民族認同的共同語是不行的。推廣民族共同語是一個先進的民族、一個發達的國家所不能沒有的舉措，也是衡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明水平的重要標誌之一。另一方面，千百萬人民羣眾在認真學好普通話的同時，卻又或多或少地擁有自己從小便掌握的地域性交際工具——方言，時而用普通話進行交際，時而用方言進行交際，視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對象而定。這不正是語言應用多元化的真實寫照，不正是“推廣普通話，保留方言”這一政策的具體體現？

實際上，推廣民族共同語和保持語言文化的多元化並非水火不容。語言（方言）的本質決定了要提倡、推廣一種共同使用的語言並非難事，可是，要禁絕、要限制一種在社會上廣為流通的語言（方言），往往卻是既不可為、也不能為的事情。語言（方言）活在人們的嘴裏，是隨着人類傳宗接代而來的東西，任何人從呀呀學語時就自然而然地學着父母親和周圍人羣所使用的語言工具來開始和人家對話。在我國，這最早習得的第一語言——母語，大概就是漢語方言。至於全民族、全社會共同使用的語言——普通話，就各方言區的人來說，大都是進入學校、接觸社會以後才逐漸學習的語言。一種是從小自動養成的，一種是後來逐漸學得的；一種是在家庭中使用的，一種是在社會上使用的。兩種不同的語言（方言），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使用場合，實在沒有必要只用一種、放棄一種。語言習慣是人們各種生活習慣中最容易表露出來的一種。“鄉音無改鬢毛衰”，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歸來兩鬢如霜，可還是“鄉音無改”，這說明什麼？說明語言習慣勢力的穩固性，也說明語言應用多元化的社會基礎是難以動搖的。正是由於這種難以改變的社會基礎，決定了進入到二十世紀以後，在許多實現現代化的發達民族、發達國家中，多元化的語言生活依然比比皆是。語言（方言）是文化的載體，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在豐富多彩的多元語言中得到充分的表現。正因為這樣，我國在方言地區大力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也大力弘揚具有濃

厚地方色彩，以各地方言演唱的各種地方戲曲，並把這看作是“百花齊放”的具體體現。從百花齊放的各種精彩戲曲中，我們可以領略到各色各樣被戲曲藝術家們巧妙運用着的方言土語的神韻。這不正有力地說明在大力推廣普通話的同時，決不能忘記充分發揮地方方言在弘揚華夏文化中的作用嗎？

當然，在這個語言文化多元化的社會中，如何調節好民族共同語的廣泛應用和各地方言的適度應用，如何保證民族共同語在方言複雜地區，特別是方言勢力比較強勁的地區得以迅速普及進而成為社會應用中的主體語言，倒是很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兩年一屆在深圳特區舉行的“雙語雙方言”學術研討會，中心議題正是圍繞着方言地區雙語並用中出現的各種現象及帶來的各種問題展開的。從1988年開始，迄今這一主題明確的研討會已開過八次，出版過八本會議論文集了。雙語雙方言的研究十多年來能夠持續繁榮，正反映出我國語言學者樂於面對社會語言應用的實際，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學風，也反映出語言學者們着力貫徹語言研究為語言應用服務的精神。“雙語雙方言”是個含糊的說法，其實它所指稱的是包括雙語雙方言及其上線多語多方言的眾多社會語言應用現象。一個地區存在着多種為當地羣眾，哪怕是一部分羣眾所習以為常地使用着的方言，這些地方方言和全民通用的民族共同語並存並用，有主有從，形成一個個多語言（方言）多文化的社會共同體。我們研究語言的人，自然不會輕易放過這樣好的語言研究課題，理所當然地要深入調查、全面分析、認真研究。如果我們把歷屆雙語雙方言研討會結集刊行的八本論文集仔細瀏覽一遍，一定會有眼界大為開闊的感受，也一定會對國家所推行的語言政策心悅誠服。大量事實告訴我們：必須正確認識語言（方言）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正確理解民族共同語和地方方言並非水火不容的關係，全面領會普通話必須推廣、方言可以保留的道理。這樣才不至於在異彩紛呈的語言大觀園中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在豐富多彩的漢語諸方言中，南方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方言

(粵語)和以上海話為代表的吳方言(吳語)都是流通較廣、影響較大的地域性語言交際工具。廣州所處的珠江三角洲和上海所處的長江三角洲正是我國經濟最為發達、改革開放走在前面的地區。在當前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經濟的發展對語言(方言)的傳播和擴散可真不能小看。君不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沐浴着改革開放春風的珠江三角洲,隨着地方經濟的迅速起飛、市場經濟的向外擴展,不少原先只在本地區流行的粵方言詞語“北上”滲入民族共同語,逐步為民族共同語所吸收,以至於一些以“粵港新詞語”為題的著述和工具書應運而生。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方言,其應用價值自然也會隨之提高。廣州是如此,上海又何嘗不是如此。作為我國最大、遠東著名大都會的上海,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其經濟實力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幾乎佔了半壁河山,那時候有的上海方言詞語也曾隨着上海強大的經濟文化勢力悄悄進入“國語”。可是,當年的國情跟如今的國情大不一樣。總的來說,社會的發展是語言(方言)發展的動力,社會從政治、文化、經濟諸方面對語言(方言)發揮影響,但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卻是不平衡的。以往在很長的時期中,政治及文化曾經對漢語及其方言的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現代漢民族共同語主要就是靠着政治和文化的力量而形成的。那時候中國在全國範圍內還談不上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道路,經濟因素在漢語及其方言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就微不足道了。這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南方經濟飛躍發展的形勢大不一樣,當年上海方言詞語對共同語的影響,也就跟時下粵港詞語的大舉“北上”不同日而語了。社會在發展,時代在前進。曾幾何時,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珠三角”經濟大發展之後,進入九十年代,上海又以浦東新區的建設為起點,登上了經濟大發展的快速列車。這些年來,上海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大大超過八十年代的“珠三角”。在這種形勢下,當前的上海方言必然又會倚仗經濟發展的雄風,逐漸發展成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粵方言“北上”之後另一個深受青睞的“強勢

方言”。

語言學習的動力始終是語言應用的需要。在多元語言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不同的語言（方言）之所以能夠並存並用，總是有各自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就香港這個特殊的地方來說，在漫長的殖民統治時期，粵語和英語在社會語言應用中一直唱着主角。1997年主權回歸以後，由於和祖國大陸的往來日益頻繁，作為祖國全民通用語言的普通話應用的頻率不斷增高，加上回歸後香港同胞在心態上普遍存在的歸屬感，就使得原先並不通行的普通話也逐漸得到推廣並在社會語言應用中佔有一席之地。如今近七百萬的香港居民中，公務員、教職員也好，普通平民百姓也好，只要有可能，大家莫不願意學點普通話來適應和內地交往日益密切的交際需要，“兩文三語”的語文應用格局也就這樣形成起來。“兩文三語”只是就總體而言，拿口語的應用來說，實際上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融、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人們通常用來交際的語言（方言），何止是“三語”而已！據我所知，上環一帶聚居的潮汕人、北角一帶聚居的閩南人，以及散居港島各地的江浙人、客家人、海南人……在他們生活的屋邨、社區裏，人們也經常使用家鄉的方言來相互溝通，上海話、潮汕話、客家話、海南話等等也都分別在一定範圍內發揮着交際語言的作用。近年來，隨着上海及其周邊長江三角洲經濟的大發展，港人北上江浙一帶投資設廠、從事經貿活動的越來越多，這又在部分港人中興起了一股學習上海話的熱潮。不少平素說慣廣州話的香港人，為了到上海及其周邊地區謀求發展，深感懂點上海話會方便一些，也就學起上海話來。在這種形勢下，香港開始有了教學上海話的“教室”，書店裏也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學習上海話的小冊子，一股柔和的上海風悄悄向香港吹來。在這方面，本書作者湯志祥博士正是喝上“頭啖湯”。他是一位能夠及時發揮所長，把自己的學識貢獻給渴望學會上海話的港人的一位語言學者。曾經他編寫的系列教材“簡明當代上海話教程”就以《基礎上海話》、《上海話生活通》、《上海話商務通》等就及時推出，而且一版再

版，真是與時俱進，摸透了社會的需求。志祥博士的實踐有力地印證了語言研究，特別是方言研究為社會語言應用服務的一條使語言學科充滿生機、充滿活力的康莊大道。

我和志祥博士相交近二十載。當年他負笈滬上攻讀語言學碩士學位時，導師正是我的摯友許寶華兄。南來這一二十年，志祥博士以其深厚的功力和敏銳的觸角孜孜不倦地默默耕耘在漢語方言這塊沃土上，就他最熟悉的吳粵兩大方言深入鑽研，寫出了不少很有見地的論文來。他是廣州花縣（今廣州市花都區）人，又是自童年起長期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一個天生能說一口相當地道的廣州話、同時又通過後天的長期學習掌握了一口堪稱流利的上海話的方言學者，以其深諳兩大方言奧秘的優越條件來研究上海話和廣州話，自然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了。如今他在出版過系列上海話專著和教材、發表過好些有關廣州話辭彙的專論以後，進一步挖掘自己研究吳粵兩大方言的潛力，下工夫編寫這麼一部兼具實用性和學術性的“粵—普—吳”辭彙對照手冊。我想，這真是中國語言學界，特別是我們廣東語言學界的一件喜事，值得拍掌叫好！把方言和普通話的辭彙對照列出，這本身就是既有利於推廣普通話、又有利於掌握方言實況，堪稱一箭雙鵰的大好事。據我所知，此前香港曾子凡先生就曾做過不少對比粵方言和普通話辭彙的工作，出版過《普通話·廣州話口語詞對譯手冊》等多種實用的粵普對比專著。可是，像志祥博士這樣把廣州話、上海話和普通話的辭彙異同列出，編成三語（方言）對照的手冊，卻是前所未見的創新。這樣一本三語（方言）對照的新書，不僅對於“推普”能產生明顯促進作用，不僅能讓那些想學會廣州話或上海話的人從中受益，而且就是從方言研究的學術層面上來說，對於漢語方言辭彙的研究，必然也很有參考價值。

這本包含六千詞語的三語（方言）對照手冊，凝聚着作者多年研究吳粵兩大方言的心血。志祥博士能把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轉化為社會語言的應用，這是值得讚賞的。相信有機會讀到此書的讀

者，一定也會懷有讚賞之情。我願意竭誠推薦此書，並期望志祥博士繼續努力，不斷把自己的新成果推向社會，為社會語言應用多做貢獻！

2003年9月5日於廣州暨南園

序言

許寶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神州大地，北京、廣州、上海這三座國際大都市更顯得生機勃發，名望益隆。九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一個以香港為龍頭的“珠三角”華南經濟圈崛起在嶺南大地。緊接着，一個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華東經濟圈在長江之濱日顯崢嶸。一個以京、津、唐（山）為代表的“環渤海”華北經濟圈在冀北平原巍然矗立。三個巨型經濟圈的湧現，正引領着中國快速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目標進發。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三地的文化建設也日新月異。人們因交際、溝通和工作需要，不僅學習普通話的熱情日漸高漲，而且還感到需要學習通行於“珠三角”的廣州話和通行於“長三角”的上海話。

最近數月間，湯君志祥教授來電和面晤時，均言及邀我給他的新著《廣州話·普通話·上海話6000常用詞對照手冊》寫個序，並先後寄來書稿、〈凡例〉及〈前言〉、〈後記〉等，心意甚誠。於是我陸續抽閱了這部書稿，覺得它頗有創意，很值得說幾句肯定性的“好話”。我最想說的一點讀後感就是此書具有突出的創新性。

首先，它具有開創性。由於北京、香港（廣州）、上海三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歷來研究普通話和粵滬方言的學者眾多，他們所積累的研究成果，林林總總，甚為繁博，但就

三地方言詞語作對照比較者，如果不是囿於敝人的見聞，這部對照手冊可算是第一本。這項研究，選題對路，可謂得風氣之先，適應了客觀需要，因而稱讚其具有開創性，也就並非過譽之詞。

其次，它具有無可替代的實用性。在當今社會，固然仍需要做“為研究而研究”型的基礎研究，但也同樣需要做直接為大眾需要服務的應用研究。後者過去常常被忽視乃至輕視，而本書作者於此二者卻處理得很好，多年以來既做基礎研究，又做應用研究，成果豐碩。這本對照手冊主要是為三地人士“學話”服務的，是一項應用性研究成果，即如作者所說，主要是幫助使用廣州話的人士學習普通話和上海話，同時亦能幫助使用普通話的人士學習廣州話和上海話，或者幫助使用上海話的人士學習廣州話和普通話。北京為首善之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既是漢族漢語的共同語，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的全國通用語言，要求人人都要會說；而方言在一定地域內通行，在當地工作和長期生活的，學會當地話也是有用的。這本對照手冊既有利於學習普通話，也便於學習廣州話和上海話，一書多用，簡明、方便，它的功用似是現有其他方言著作無可替代的。因而這本對照手冊的出版，為我國應用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也同時為比較語言學的應用提供了一個範例。

復次，它融會現有詞彙研究成果，創造出新的學術價值。普通話、廣州話、上海話這“三話”的詞彙研究成果已有許多，但多數著作是羅列一兩處地點方言的詞用普通話來註釋，少量著作則以同一大方言區的許多地點方言的詞彙跟普通話對照比較，像本書這樣羅列、對比三大方言（官話、粵語、吳語）的三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地點方言詞彙的著作過去尚未有過。方言跟共同語以及方言之間的親疏關係，距離越遠，對照比較時遇到的問題就越多越複雜。這本對照手冊是跨三大方言的第一本，其中可利用、可借鑑的資料勢不在少，同時，在編撰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也必然很多，諸如收錄哪些詞條、如何選用條目用字、如何編排、如何注音、如何釋義

等等，都是很有難度的，其“創業”的艱辛完全可以想見。好在志祥教授一直從事漢語語言學的研究和教學，學養深厚，特別是他跟這三地“三話”早就結了因緣，熟悉三地風土人情，又對“三話”具有很強的語用敏感性。志祥教授集諸種有利條件於一身，對解決手冊編撰過程中遇到的學術問題也就自然能駕輕就熟、迎刃而解。故本書不是一般匆促編成的手冊，而是一部甚見功力的著作，是作者艱苦勞作和智慧的結晶，也是融會現有詞彙科研成果進行再創造、具有新的學術價值的一項優秀成果。

綜上所述，這本對照手冊具有突出的創造性，它的出版問世，將不僅會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也會受到行內行外人文社會科學界專家學者的稱道。

是為一則讀後，權充為序爾。

2003年7月中旬於上海海灣新苑求實齋

前言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口大國，而且也是最有名的方言大國。僅拿漢語一語來說，其內部方言之多、之難懂、之難說、之不能相互通話，恐怕也是環球赫赫有名。例如一個北京人聽不懂湘西話，一個上海人聽不懂梅州話，一個西安人聽不懂海南話；甚至同在福建省，同樣屬於閩語方言區，一個講閩南話的廈門人怎麼也聽不懂閩北的福州話；同在廣東省，同樣屬於粵語方言區，一個講廣州話的廣東人完全會聽不懂粵西的台山話……如此這般的現象在中國向來是比比皆是。漢語難，漢語方言難，自古以來莫不如此。

正因為這個原因，某些外國的語言學家甚至認為，應該把中國漢語的方言看作是完全不同的“語言”，因為在歐洲大陸即便是某些被稱之為不同國家的“語言”，它們相互之間的能懂度最高能達到70%呢！那怎麼去評說互相一點兒也不能溝通的漢語方言呢？當然這些論斷並不為大多數的學者所認同。因為幸虧諾大一個中國有漢字，漢字是我們祖先的偉大發明。漢字是“超方言”的。漢字既溝通了講不同方言的整個中華民族及其海外華人、華裔，還記錄了數千年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幸虧諾大一個中國還有普通話，普通話（商周稱之為“雅言”，秦漢稱之為“凡語”、“通語”，明清稱之為“官話”，民國稱之為“國語”。現在叫着“普通話”，也稱之為“華語”）也是漢族文化的輝煌成就。普通話同樣是“超方言”的。千百年來普通話既維繫着生活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的炎黃子孫，又傳承着矗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華族、華人文明。

君不見，事到如今普通話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因為現在的普通話不僅僅是漢民族的“共同語”，也是包括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大家庭的“共同語”，還是中國的“標準語”——中國政府“官方語言”，甚至在聯合國，漢語普通話早就是該國際組織的六大工作語言之一^①。無怪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學好漢語普通話，走遍天下都不怕。”普通話要學，普通話應該學，而且一定要學好！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迎來了令世界矚目的快速增長期。中國經濟二十多年來持續不斷的飆升造就了兩大著名經濟區——位於華南珠江三角洲的“珠三角”經濟區和位於華東長江三角洲的“長三角”經濟區。這南北兩個較為發達的經濟區像兩個“引擎”，帶動了中國經濟這架大飛機迅速起飛。

衆所周知，經濟和文化、經濟和語言是緊密相關的。經濟的繁榮一定會帶來文化的興盛，經濟地位的提高必定會造成語言價值的上升。曾記否，自八十年代起，“珠三角”的經濟繁榮曾帶動省港澳的衆多事物“大舉北上”。一時間神州大地處處出現穿港式服飾、唱港台歌曲、用粵產家電、飲粵式早茶、嚐粵式菜餚、甚至學講粵語的“時髦”風尚。也因為這樣，大批的粵語詞語順理成章地被普通話吸收。曾記否，彷彿是“一夜之間‘先生’、‘小姐’代替了‘同志’和‘師傅’；‘巴士’、‘的士’也取代了‘公共汽車’和‘出租汽車’；‘結賬’一詞不知何時已經讓位給‘買單（埋單）’；‘大哥大’、‘拷機’日益成為身份的象徵；‘按揭’、‘物業’等詞不斷出現在報刊和廣告的標題中；‘扮靚’、‘搞定（搞掂）’也逐漸為人們所樂用；‘勁歌’、‘金曲’則天天縈繞耳邊，揮之不去；‘吃生猛海鮮’、‘唱卡拉OK’儼然已經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粵語在八十年代能一時‘崛

① 聯合國其他五大工作語言是：英語、俄語、法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